

解读斯托内克尔的“语用学”

作者：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陆世雄

[摘要] 20世纪70年代初，逻辑语义研究和语境因素相结合，语用学进入关键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取得突破进展的有美国的哲学家斯托内克尔。本文介绍他的一篇题为“语用学”的文章。其目的是为语用学开辟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也说明对它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 语用学；语境；可能世界；语用预设

1977年，《语用学杂志》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创刊时，发表了编者哈伯兰和梅伊共同署名的社论。社论指出：“语言的语用学，粗略地较宽泛地说，就是研究语言运用的科学”。该刊的发行，标志着语用学“作为语言学的一门新兴学科而得到确认”。此后，语用学迅速发展，“80年代是它的定型阶段，90年代则是这个学科的成熟、丰满期”。

然而，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语用学的发展却少不了哲学家，尤其是逻辑语义学家的贡献。系统的语用学理论研究文献通常会提到莫里斯、卡尔纳普、巴尔-希勒尔等哲学家的名字。令人不解的是，国内出版的相关刊物似乎极少有人提到一位美国的哲学家斯托内克尔。正是他首先提出了“语用预设”的概念。这一名词出现于他1970年发表的“语用学”一文。

一、“语用学”一文的写作背景

20世纪语言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粗略地归纳为“形态→句法→语义→语用”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六十年代，句法学和语义学方面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了，而语用学能不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如何定义语用学却还没有定论。

20世纪50年代末，尽管随着一些学者如巴尔-希勒尔和马丁的研究的进展，形式或纯语用学逐渐成形，但是其研究对象基本局限于“指引词语”，如人称代词、时间和地点状语。后来，这方面的研究在刘易斯和蒙塔古推动下进一步发展。蒙塔古语法就是由蒙塔古创立，按照形式语义学的模型理论搞纯语用学的研究的。

斯托内克尔了解到这些情况。他指出，“尽管语用学问题曾经有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以及一些语言学家非正式地研究过，但是形式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基本上忽视这类问题，或者把它们推向语义学或句法学范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斯托内克尔作了“初步”的探讨，试图通过划分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界线来为语用学确立研究课题。

二、“语用学”一文的内容介绍

1、指出传统的形式语义研究范畴内不能完满解决的哲学问题

斯托内克尔从语义学研究切入，指出莫里斯和卡尔纳普对语义学所作定义的模糊性。然后，他把语义学简单地定义为“研究命题的学科”。接着他简略叙述“命题的真值如何确定”和“语义学研究的模式”。

在解释如何确定命题的真值时，斯托内克尔借用了“可能世界”这一术语。至于如何定义“可能世界”，他表示无能为力。事实上，他仅仅想说明，命题作为一个规则或者函项(function)不仅被导入真实世界还会被导入“可能世界”以考察其真值。他认为，如果把命题解释为通过可能世界导入真值的函项，那么命题就具有传统上认为它们应有的属性；命题的考察既可以脱离特定的语言和语言样式（指表达命题的句子），也可以脱离含有命题的语言行为类型（如含有被断定或命令的命题的断言和命令）。

斯托内克尔简述形式语义研究的运作模式，目的也是为了证明这种研究在根本上和语言（不论是自然语言还是人工语言）没有联系。当然他不否认语言和人们对命题的认识有因果

关系的可能性。研究自然语言的语法会使人们更充分地认识命题的本质，然后更明确地区分命题，这一点他也不否认。

他认为，尽管命题研究可以脱离语言来进行，但对语言和命题的关系的解释仍部分地属于语义学的范畴。语义研究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规则以便把自然语言的句子与它们所表达的那些命题直接联系起来。问题在于，多数情况下，这些规则并不把语句和命题直接联系起来，而是把语句与和使用语句的语境的特征相关的命题联系起来。这些语境特征就属于语用学研究课题的一部分。

2、定义“语用学”

斯托内克尔给语用学下了个简洁的定义，即“语用学是对语言行为以及实施这些行为的语境所作的研究”。通过这一定义，他很自然地得出语用学范畴内所要解决的两大类问题：一是划定有趣的言语行为和言语产物（speech products）的类型；二是描述语境特征以利于确定某一句子所表达的命题。

至于第一类问题，斯托内克尔给的例子是对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s）的分析。他认为，分析这些行为就是为行为的成功实施找出充要条件。由于充要条件通常牵涉到各种各样的语境因素的出现与否，所以这是一个语用学问题。他提供的语境因素包括：说话者的意图，说话者与受话者的知识、信仰、期望或兴趣，在同一语境中实施的其他言语行为，说话的时间、效果，该命题的真值，以及该命题和其他多少与之有关的命题的语义关系。

斯托内克尔重点研究第二类问题。他以“everybody is having a good time”、“We shall overcome”和“That is a great painting”为例，说明人称代词和指示词的解释明显地依赖于语境。情态动词（如 can, may, might, must 等）的解释同样依赖于语境，这是为人熟知的。

至此，斯托内克尔给读者勾划出一个方案：（如下图所示）

根据这一方案，语境和可能世界两者部分地决定了一个特定的句子所表达的真值。

斯托内克尔认为，蒙塔古对语用学的研究是一种较简单的做法。后者研究的是真值而不是命题如何依赖于语境；这样语境部分地成了产生句子的可能世界。可见，从语境到命题这一步被忽略了。斯托内克尔把这种研究称为“语用语义学”。

然后，他着手证明这一步的必要性。他的依据有两个。第一，命题是独立的。一个命题应该是陈述、判断、承诺、愿望和需求、问话和答话的共核，即可能性或大或小的事情；而句子的意思或者直接依赖语境判定真值的规则均不可能代表这些事情。他举例说明：

① —Are you going to the party?

—Yes, I'm going.

答话是恰当的，因为被肯定的命题正是问句表达的。根据较简单的分析方法（指蒙塔古创立的），除了真值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成为问话和答话的共核。然而以下对话中

② —Are you going to the party?

—Yes, snow is white.

答话是不恰当的，因为尽管问话和答话都带有真值，但不足以成为共核。

为了进一步说明句子的意思不能代表命题，斯托内克尔又举一例：

③ O'Leary says at the party, "I didn't have to be here you know."

并分析道，说此话的人（即 O'Leary）意思大致是“O'Leary 到场是没有必要的”；而命题则是“O'Leary 声称没有必要的事情”。如果 O'Leary 既没有义务也不是被迫参加晚会，那么他说的话是正确的。而依据蒙塔古的那一套，如果命题是句子的意思，那么 O'Leary 就是错的，因为从各方面看“我在这儿”是真。

第二，语境和可能世界有不同的功能。他以“*He is a fool*”为例。当 *he* 指代不明时，也就是人称代词 *he* 这一语境因素不明确时，我们无法知道“*He is a fool*”表达的命题是什么，故命题的真值无法判断。如果 *he* 指代明确，但事实无从知晓，也就是可能世界不定，我们虽然清楚句子表达的命题，但还是无法判定它的真值。

当然，斯托内克尔举这些例子是想证明语境和可能世界是不同的，以便把他倡导的语用分析与蒙塔古的区分开来。他的目的不在于提供一条准则以便给人们区别决定真值的因素哪些属于语境哪些属于可能世界。

3、引入“语用预设”概念

为了进一步证明语境和可能世界两者有区别，斯托内克尔提出了“语用预设”（*pragmatic presupposition*）的概念。

首先，他区分了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我们知道，语义预设可以用“否定测试法”（*negation test*）来检验，即如果说 *P* 预设 *Q*，那么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 (1)如果 *P* 真实，*Q* 也真实；
- (2)如果 *P* 不真实，*Q* 仍然真实。

斯托内克尔指出，语用预设不是句子或命题而是人作出的预设，是一种命题取向（*propositional attitude*）。关于两者的关系，他说，特定的语境里表达的一命题如果带有语义预设，这一预设通常同样是该语境里的人所作出的语用预设，但反过来则不然。

接着，他指出语用预设的一些属性，依据他的观点，语用意义上预设一命题即是把该命题认为是真实的，并假定语境中其他人也同样认为；如果要避免误解，同一语境的参与者有必要持有相同的一组预设。他强调预设不一定是真实的，但至少被认为是真实的。

同时，他认为，特定语境里一个人所作的一整组预设决定了一类可能世界；这类可能世界与这组预设保持一致。这类世界设定了语言情景的外延。

4、分析语用歧义出现的原因

斯托内克尔引入语用歧义的话题仍然是想说明蒙塔古创立的语用学解释力不足这一问题。他借用了邓南伦（*K. Donnellan*）对确定性描述语（*definite descriptions*）的指称性用法和描述性用法的区分方法。

邓南伦是美国哲学家，研究逻辑语义。他的文章 *Reference and Definite Descriptions* 发表于 1966 年，是对罗素（*B. Russell*）与斯特劳森（*P. F. Strawson*）之争的评判。他认为罗素和斯特劳森均有偏颇之处，那就是：前者忽视了确定性描述语的指称性用法，而后者却没有看到确定性描述语的非指称性用法。区别描述性用法和指称性用法，是邓南伦评判两种权威理论的基础和理论武器。他提到了确定性描述语的使用场合（*occasions of its use*）不同，其功能也不同。

显然，斯托内克尔受此启发，并把“使用场合”作为“语境”来解。首先他举了几个例子，其中之一为“*The man in the purple turtleneck shirt is bald*”。这个句子含有确定性描述语“*the man in the purple turtleneck shirt*”。按照蒙塔古的作法，混同“可能世界”和“语境”两个概念，这个句子就看不出带有任何歧义。如果区分了句中确定性描述语的用法，也就是区分了语境和可能世界，就发现句子的歧义现象。

然后，斯托内克尔指出，区分确定性描述语的用法至少会引起三种重大的变化。第一，在含有情态动词和涉及命题取向的语境中，区分两种用法甚至会引起含有确定性描述语的陈述的真值发生变化。第二，如邓南伦指出的那样，这一区分会引起陈述句的语境所必须的预设发生变化。第三，如果确定性描述语未能起到真正的确指作用，要考察其后果，这一区分就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斯托内克尔把语用歧义的考察范围扩大，指出了条件句、含有情态词的句子、含有所谓的括号动词（*parenthetical verbs*）的句子等也有潜在的语用歧义。如果用来解释某个句子

的某条规则既可应用于语境又可应用于可能世界时，这个句子就会产生语用歧义。

5、“语用学”一文结论

在这一部分斯托内克尔归纳了文章的要点，并承认在描述这一语用学理论框架过程中，他采用了一些未经定义和有争议的概念，如可能世界、语境和预设。这一做法可能会招来批评，但他认为该理论的成功与否不应该依赖于那些概念能否定义，而取决于它是否提供一种机制来确定有趣的语言行为和区分重要的概念。

三、“语用学”一文发表的意义

斯托内克尔的写作目的是想为语用学开拓一个研究领域。然而以他哲学家的身份，最终是想借语用研究来解释逻辑语义学所难以解释的哲学问题。所以他的文章中出现“可能世界”、“模态逻辑”等哲学术语。他给语义学和语用学划定的界线仅代表一家之言。事实上，1981年阿尔伍德（Jens Allwood）指出尚未形成区分两者的方法。

如前所述，斯托内克尔的贡献是他最早提出了“语用预设”。在70年代，这一概念成为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竞相讨论的焦点。基南（Keenan）把它定义为“联结话语和语境”的一种关系，并指出“句中的话语在语用意义上预设了它的语境为恰当的”。斯托内克尔先是在这篇文章中把它视作一种命题取向，后修改为“共有知识”。后来还引起了卡图南（L. Karttunen）与卡兹（J. Katz）和朗根敦（D. Langendoen）的论争。不过，“语用预设”的正式“寿命”不长，1977年即被卡图南和皮特斯（S. Peters）宣布“逝世”了。这两位学者提出把预设细分为：（1）特殊化的会话含意（如虚拟条件式）；（2）普遍化的会话含意（如判断动词）；（3）话语的合适性预备条件；（4）规约含意（如叙实动词，even, only, but）。

斯托内克尔的另一贡献是他把语境引入了语用研究。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框架区别于蒙塔古的纯语用研究方法，他设法区分“语境”和“可能世界”，并从邓南伦那里获得理论支持。他还借此确立了一个从句到命题真值的推导方案。这些的确给后来者提供了更广阔的研究前景。我国语用学研究方面的专家何兆熊先生说，“语境因素一旦进入了语义研究的范围，便为语用研究开辟了道路。语用研究进而迅速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四、结语

学习早期的语用学研究文献使我们明白语用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哲学家的重要贡献。如本文讨论的斯托内克尔的文章中，“语用学”的概念成形于美国哲学家莫里斯的符号学三分说，尔后奥地利哲学家卡尔纳普把它加以宣传推广；“预设”于十九世纪末由德国哲学家弗雷格（G. Frege）引入语义研究；“可能世界”理论则远在17世纪时由德国的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G. W. Leibniz）创立，后来美国的哲学家克里普克（S. A. Kripke）在发展模态逻辑语义理论时重新启用了这一概念。可以说是哲学家，尤其是逻辑语义研究方面的语言哲学家，为语用学这门学科的独立打下了理论基础。学习语用学而不割裂它与语义研究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语用研究的指导理论。

[参考文献]

- [1] Allwood, Jens. 1981. On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A]. in Asa Kasher . (ed.) Pragmatics: Critical Concepts[C]. (Vol.I, pp.114-26)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2] Caffi, C. Presupposition, Pragmatic[A]. In Jacob L. Mey. (ed.)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Pragmatics[C]. (pp. 751- 8) Amsterdam: Elsevier, 1998
- [3] Donnellan, K. 1966. Reference and Definite Descriptions[A]. in Robert J. Stainton (ed.) Perspective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 Concise Anthology[C]. (pp.313-32) Peterborough, Ont.: Broadview Press, 2000
- [4] Karttunen, L. 1974. Presupposition and Linguistic Context[A]. in Asa Kasher. (ed.) Pragmatics : Critical Concepts[C]. (Vol.IV, pp.32-46)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5] Katz, J. & D. Langendoen. 1983. Pragmatics and Presupposition[A]. in Asa Kasher. (ed.) Pragmatics: Critical Concepts[C]. (Vol.IV, pp.47-68)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6] Mey, Jacob L..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 [7] Stalnaker, Robert C. 1970. Pragmatics[A]. in D. Davidson and G. Harman (eds.). Semantics of Natural Language[C], (2nd ed., pp.380-97)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Reidel, 1972
- [8] Van der Does, J. Possible worlds [A]. in Peter V. Lamarque(ed.),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C]. (pp.355-8)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7
- [9] 何兆熊 (编). 新编语用学概要[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10] 何兆熊. 90年代看语用[J]. 外国语. 1997(4): 1-4
- [11] 何自然. 什么是语用学[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7(4): 20-25
- [12] 胡壮麟. 语用学[J]. 国外语言学. 1980(3): 1-10
- [13] 沈家煊. 语用学和语义学的分界[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0(2): 26-35
- [14] 索振羽 (编). 语用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作者简介: 陆世雄(1974-), 男, 广西宾阳人, 河池学院外语系讲师, 广西师范大学在职研究生, 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学